

楊永興

作為中共中央主辦的一份政治理論性刊物，《紅旗》雜誌於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它在毛澤東晚年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倡議、籌備到創刊，毛澤東對《紅旗》始終是非常重視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紅旗》是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的產物。

一 倡議創辦《紅旗》

1958年5月2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此次會議「決定由中央主辦一個『革命的、批判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雜誌』，定名為《紅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陳伯達擔任總編輯」，「要求全黨積極地支援這個雜誌，要求各級黨委經常供給稿件」，而且「除了在中央成立一個編輯部以外，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應成立一個編輯小組，負責徵集、初步審定和修改稿件」¹。據《紅旗》雜誌總編陳伯達回憶，《紅旗》雜誌是毛澤東首先倡議的，「雖然決定出版《紅旗》是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才做出正式決定，但是籌備工作早就開始了」²。籌備工作開始於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後，因為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澤東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3月9日，成都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二 五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二四個問題就是關於「出版理論刊物問題」³。在2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著重講了辦刊物的問題。他說：

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 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向導》、《鬥爭》、《實話》等雜誌，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誌。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⁴

其中提及的「辦刊物」指的就是《紅旗》雜誌的創辦問題。

接著，毛講了「怕教授」的問題，為此還特意表揚了陳伯達一番，認為陳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說：

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象甚麼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

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龍恩』的殘餘。我看再不能忍受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

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誌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厚今薄古）、一封信（給主席的），一個通知（準備下達），有破竹之勢。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奮工作好，但統治宇宙膽子小了。⁵

其中談到陳伯達的「一篇演說」，是指陳伯達1958年3月10日應郭沫若邀請，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目為「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陳在講話中主要談哲學社會科學如何躍進的問題，他說，哲學社會科學應該躍進，也可以躍進，而躍進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邊幹邊學。陳伯達晚年回憶，說此次講話「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向社會科學界傳達毛主席的觀點」，並不是「自己擅自決定的」⁶，而後來他在《紅旗》1959年第13期發表的「批判的繼承和新的探索」一文，是對此次過於偏激的講話的一個糾正。這可以說是一個遲到的糾誤，而且足足遲到了一年半，其所造成的危害已經鑄成，其政治使命已經完成。不過作者的認錯態度還是值得肯定的，畢竟只是一個時刻按照最高領袖指示寫作的文人，很多時候是身不由己的。而「一個通知」是指準備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後於1958年4月2日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另外，毛澤東還多次強調：

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三歲開始講學，學問是慢慢學來的。耶穌年紀不大，有甚麼學問？釋迦牟尼九歲創佛教。孫中山青年時有甚麼學問？他的學問也是後來學來的。馬克思開始著書時，只有二、三幾歲，寫《共產黨宣言》時，不過三、四歲左右，學派已經形成了。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年紀不甚大，學問不甚多，問題是看你方向對不對。年輕人抓住一個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過他們的。梁啟超年輕時也是所向披靡，而我們在教授前就那麼無力，怕比學問。辦刊物，只要方向不錯，就對了。現在我們要辦刊物，要壓倒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我們只要讀幾本書就可以把他們打倒。刊物搞起來，就逼著我們去看經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動手寫。這就可以提高思想。現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不辦刊物，大家就不想，不寫，也不會去看書了。

各省可辦一個刊物，成立一種對立面，並且擔任向中央刊物發稿的任務，每省一年六篇就夠了。總之，一篇以下，由你們去組織，這樣會出現英雄豪傑的。

從古以來，創新學派、新教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歷史難道不是如此嗎？我們開頭搞革命，還不是一些娃娃，二、三多歲，而那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段祺瑞、譚延闓、趙恒惕都是老氣橫秋的。講學問，他們多；講真理，我們多。⁷

從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中，不難看出毛澤東辦刊物，一方面是想壓倒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同他們爭奪理論陣地，另一方面是想借此提高中共領導的理論水平，解放他們的思想，以便使他們能夠放手大膽地支持毛澤東即將發動的「大躍進」運動。他用「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等論斷，來鼓舞士氣，告誡與會者沒有必要怕教授，因為雖然他們學問多，但是真理掌握在我們手裏，就像辦刊物一樣，只要方向正確，就可以了，言外之意是為保持方向正確，對資

產階級思想務必嚴加批判，即使是上綱上線，也在所不惜。當然，毛澤東在這裏之所以一直告誡與會者不要怕教授，主要還是為了打破對教授的迷信，也就是打破對科學知識的迷信，以便為其「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掃除思想障礙，而這也正是毛澤東辦刊物的主要因素之一。

對此，參加過1958年3月成都會議的當事人《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和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笏，在其回憶錄中也都提到：「毛主席在3月22日講話中談到『提高風格，振作精神』時，批評陳伯達過去死也不肯辦一個理論刊物，膽子太小，這次才振作精神，下決心辦」⁸，「毛主席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也要辦自己的理論刊物。各省辦的刊物，也要富有理論色彩，內容不一定限於本省，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談。」⁹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敘述成都會議時，也略微提到：「為了活躍黨內思想，在領導幹部中形成帶頭學理論、想大事、抓大事的風氣，毛澤東提議創辦黨的理論刊物，中央辦一個，各省都辦一個。」¹⁰葉永烈在《陳伯達傳》中進一步指出：「創辦一個理論刊物，這是毛澤東提出的建議。最初，陳伯達並不想辦《紅旗》這樣的政治理論刊物，卻是想辦學術性理論刊物。毛澤東不同意陳伯達的辦刊設想。這樣，陳伯達只得放棄了辦學術性刊物的意見。」¹¹李銳還提到：

陳伯達同意並受命創辦理論刊物後，由他主持召開過一次會，到的人有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等（不到 人），我也參加了。確定要組織個編輯班子。開初擬定的召集人名單中似有我，我表示自己業務甚忙，後來也就沒有列我的名字了。回北京後，我再沒參加過《紅旗》的會議，只是應約寫過稿。¹²

他們的回憶多多少少地增加了《紅旗》創刊過程的一些細節。

二 「中國人說話，全世界人都要聽」

毛澤東提出創辦刊物，除了為發動「大躍進」運動提供理論思想準備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將《紅旗》作為中國對外宣傳其政策和理論的窗口，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走向世界，逐步掌握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乃至世界的話語權。曾擔任《紅旗》副總編的王力在其晚年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創辦《紅旗》時說：「毛澤東辦《紅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中國人說話，全世界人都要聽。毛澤東認為，他的這個目的達到了。那時《紅旗》的重要文章一廣播，真是全中國人全世界人都要聽。」¹³王力所說的「那時」應該是指中蘇論戰時期，特別是《紅旗》刊登了批評蘇共的「九篇文章」的那個時候。反正在《紅旗》剛剛創刊時，這個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也就只有中國人聽。但是無論如何，王力的這段話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毛澤東迫切希望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的願望，以及想成為世界革命領袖和國際共運領袖的宏圖大志。

1955年12月，毛澤東就曾針對當時新華社在發展國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情況，作過如下指示：「應該大發展，儘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¹⁴也就是說，中國在國際上應該享有其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應該享有的發言權和話語權。雖然「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與「中國人說話，全世界人都要聽」在程度上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但是它卻是必須要經過的一個階段，因為如果連「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都做不到的話，那麼，「中國人說話，全世界人都要聽」豈不是癡人說夢！實際上，即使是做到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

聲音」，離「中國人說話，全世界人都要聽」還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最主要的是中國要提高自己的國力。只有自己國家的實力特別是經濟實力得到增強，才能進一步得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乃至國際上的認可。

對於毛，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也持有與王力比較一致的看法。他認為，毛澤東不僅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而且還有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甚至統治全世界的野心。赫魯曉夫在晚年的回憶錄中寫道：「關於毛，有一件事我很清楚。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至少在我認識他時，他常常流露出要統治全世界的急切願望，他的計劃是先統治中國，然後亞洲，然後 哪裡？有7億人，在別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一半人口是華人。」¹⁵而且他還指出：

多年來，毛澤東一直在摩拳擦掌。他一直在尋找機會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他知道，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向蘇聯挑戰。至於他所挑戰的物件是誰 赫魯曉夫還是張三李四，對他是無關緊要的。

早在1954年我第一次去北京訪問時，毛的沙文主義就已經引起了我的警惕。儘管他的態度格外熱情，我仍然從對中國民族的讚揚中覺察到了一種隱藏著的民族主義傾向。他的話反映了他的信仰，他相信中華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但這種想法同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根據我們共產黨人的世界觀，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看一個人，不應該看他是哪個民族的，而應該看他屬於哪個階級。¹⁶

在赫魯曉夫看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應該是所有自稱為共產黨人的團結，而不是毛澤東認為的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同化。赫魯曉夫在回憶此段的時候，不知有沒有想到蘇共在對待兄弟黨時所表現出來的大國沙文主義。自鴉片戰爭以來，長期遭受外國壓迫欺凌的中國，其民族主義傾向是非常強烈的。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取得勝利的老一輩革命家中，其民族主義是處於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社會主義。他們對國家的熱愛這一點是無論如何不能抹煞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在肯定毛澤東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赫魯曉夫關於毛有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想法的論述。不管赫魯曉夫的敘述含金量為多少，是否存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偏見，或者理解上的錯誤，但是之後的事實卻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毛的這一傾向。自從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了蓋子」、「捅了漏子」以後，毛澤東對這位從斯大林遺產繼承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領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態度已經是「另眼相待」了。對於赫魯曉夫「揭了蓋子」這一積極作用，毛澤東極少加以評論，雖然這個積極作用對於中國乃至社會主義陣營來說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對於「捅了漏子」，毛澤東則多加批評，幾乎到了每次開會、每次講話都要作為反例批判一番，按照他的說法，主要是因為赫魯曉夫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這把刀子怎麼能丟呢，無論如何不能丟，還要靠它來對待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呢。1957年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對於這位斯大林昔日的戰友，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的反對者，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級別上，毛澤東都給予了遠遠高於1954年赫魯曉夫第一次訪華的待遇。這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態度。

雖然出於各自需要對方支持和實際利益的考慮，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表面上看起來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團結景象，但實際上他們在對待斯大林、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等問題方面都出現了嚴重的原則性分歧。而更為嚴重的是對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問題，正越來越被提上兩人尤其毛澤東的工作日程上來。但是，這時的國際共運領袖已經被赫魯曉夫一棍子打得支離破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各國共產黨被允

許可以各自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所以重新塑造國際共運領袖權威就成為急待解決的問題。這從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釋為甚麼毛澤東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大講「團結」和「以蘇聯為首」的必要性的原因了。當然，要想確立對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權，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首先要取得平等權，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蘇共平起平坐，很顯然中共在莫斯科會議上已經充分做到了這一點。平等權的擁有，就意味著中共可以獨立自主地處理國內問題、平等地與蘇共協商討論世界問題，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充實自己的實力，無論是在理論方面還是在經濟力量方面，尤其是經濟方面，因為毛澤東自始至終認為自己的理論並不亞於莫斯科的理論，所以莫斯科會議後毛澤東將全部的精神放在發動旨在「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上面，也就不足為奇了。

至於毛澤東是甚麼時候開始產生要辦一個理論刊物的想法，筆者認為可能就在莫斯科會議之後。因為在這次會議上赫魯曉夫提出了要辦一份國際理論性刊物的倡議。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啟發了毛澤東創辦一個理論刊物的想法。對於赫魯曉夫提出的創辦共同刊物問題，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表示了他的擔心。回國之前，他特意向毛澤東告別，並提出了他的擔憂。毛澤東對他說，「刊物不容易辦好，既然要辦就要把它辦好。誰參加誰不參加由各個黨自己決定。不要搞聯絡局，也不要搞聯絡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國際、情報局那樣的固定組織。」¹⁷1957年11月20日晚，毛澤東準備啟程回國。他在去飛機場的途中，與同坐一輛車的赫魯曉夫又談了這個問題。對此，吳冷西在其《 年論戰》中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這兩位領導人的談話。他寫道：

毛主席告訴赫魯曉夫，他在昨天跟哥穆爾卡談話時講到，不要在共同辦的刊物上展開兄弟黨之間的爭論，不要一個黨發表文章批評另一個黨。在各個黨自己辦的刊物上，也不要公開批評別的黨。兩個黨之間有不同意見，可以通過內部協商，內部解決問題。

毛主席說，歷史證明，一個黨公開批評另外一個黨效果都不好。他說，這個問題跟多列士談過，跟杜克洛也談過，跟義大利黨也談過，跟英國黨也談過。他們都覺得，公開批評別的黨的辦法不好，即使意見正確，別的黨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們對這個問題能夠達成協定，不要公開我們內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開批評另外一個黨。赫魯曉夫當時也表示同意。毛主席說，這個問題我是答應了哥穆爾卡的。在最後臨別之前，給你提這麼一個建議，刊物辦起來以後，不要成為互相爭論的刊物。赫魯曉夫說，完全贊成，完全贊成。¹⁸

但是，半年後中共出版的《紅旗》雜誌，在其創刊號上就刊登了由總編陳伯達親自寫的批評南斯拉夫的文章：「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以後的中蘇論戰更是將分歧公開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1958年1月31日，赫魯曉夫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詢問關於出版共同刊物的問題。信中說：

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許多代表團提出了關於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性刊物的建議。當時約定，願意參加出版雜誌的各國黨，在進行必要的協商和準備工作以後，即著手實現這個建議。蘇共中央認為，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須要了解哪些黨打算參加出版這個理論刊物，並且就出版這個刊物有關的具體問題開始交換意見。我們的意見是，這個雜誌可作為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合刊物。它不應當成為發號施令的刊物；它將從事宣傳、研究馬列主義問題，並且是各兄弟黨交流經驗的國際講壇。一九五七年一月於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

2月27日，毛澤東給蘇共中央發了一封關於同意出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的電報，作為對赫魯曉夫的答覆。毛澤東說：「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個國際性理論月刊，作為參加這一刊物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中央委員會的聯合刊物，也同意蘇共中央所提出的關於刊物的基本原則和出版經費的分擔辦法。」「中共中央準備派出王稼祥、劉甯一、趙毅敏同志出席將於三月七日 八日在布拉格召開的創辦雜誌的各黨的代表會議。」²⁰

據《紅旗》副總編王力回憶，《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的中國版，在北京是由他在王稼祥領導下主辦的，「派到布拉格的中國黨的代表是趙毅敏」²¹。王力指出：「這個雜誌的編輯部，實際上部分地起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作用。」²²如果王力的這一說法屬實的話，那麼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後向哥穆爾卡所作的保證以及對赫魯曉夫所提的建議，並沒有被很好地得到執行。1958年8月，《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正式出版，比《紅旗》雜誌創刊晚兩個月。中共參與這一國際性理論刊物的出版，一方面可以通過它了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動態，另一方面也可以將自己的經驗和理論觀點通過它發表出來，同其他國家共產黨交流。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中共在國際上的窗口，而《紅旗》則是中共在國內的喉舌。一個是中共部分的國際性理論刊物，一個是中共黨內的理論刊物。兩者遙相呼應，將毛澤東思想以理論經驗的形式宣傳出去，又將國際共運的動態引進來作為參考，真可謂是珠聯璧合。但是，中蘇公開論戰期間，中共於1964年宣佈退出了《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編輯部。對此，王力說：「毛澤東後來認為，過早地退出這個國際組織，這是在黨的七大以後，我黨所犯的第三個歷史性的錯誤。」²³

三 參與籌備《紅旗》

毛澤東對《紅旗》雜誌是相當重視的，在其籌備出版期間，親自參加了許多相關的事宜。早在成都會議上，他就指定了由其秘書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經八屆五中全會同意通過。他高度讚揚了《紅旗》發刊詞，為《紅旗》題寫了刊頭，而且還親自擬定了《紅旗》第一任編委名單。

1958年5月24日，就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公佈出版《紅旗》雜誌的前一天，毛澤東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並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²⁴當天，他在給《紅旗》總編陳伯達的信中，談到了為《紅旗》題刊頭的問題。他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²⁵另外，毛澤東在他題寫的其中兩幅「紅旗」字的旁邊，還寫了「這種寫法是從紅網舞來的，畫紅旗」和那幅「比較從容」的字樣，以供陳伯達考慮。毛澤東一共為《紅旗》題寫了二 多幅刊頭，後來從中選出一幅作為《紅旗》雜誌的正式刊頭。王力在其回憶錄中還說：「《紅旗》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澤東決定的。」²⁶王力的這一說法，讓人不免想到文革時期的「中央文革小組」，雖然也標明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但是卻很少向政治局彙報過工作，而是直接對毛澤東負責、受毛澤東的直接指揮。從以上的種種細節中，足可以看出毛澤東對《紅旗》雜誌的重視程度。

《紅旗》編委會的陣營頗為強大。第一任編委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範若愚。對於這個編委名單，王力在其回憶錄中極力強調是「毛

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²⁷，言語中不免透露出些許自我炫耀、引以為榮之感。

但是無論如何，此編委名單可以說是基本上囊括了當時中共中央所有的「筆桿子」，而且從編委名單安排上，也不難看出毛澤東在擬定這份名單時的仔細酌量。鄧小平、彭真兩位編委都是當時中共的重要人物。自八大以來，鄧就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又是政治局常委，其地位不言而喻。他是毛澤東有意著重培養的一線領導人之一，也是毛澤東心中的接班人人選之一。彭真，當時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長。他在中央書記處協助鄧小平負總責，是在書記處居於鄧小平之下的第二號人物。《紅旗》雜誌在北京出版，當然需要得到北京市領導人的幫助和支持。

王稼祥、張聞天兩位編委，可以說中共黨內有名的兩位理論家，都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研究專家，都曾擔任過駐蘇聯大使。八大後，他們都被選為中央委員，王稼祥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兼任對外聯絡部部長，張聞天則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紅旗》作為理論刊物，他們兩位理論家也不可少。陸定一，長期擔任中共理論宣傳工作，延安時期曾任《解放日報》總編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黨報理論、新聞學等方面的文章，對毛澤東新聞理論的詮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受毛澤東的重用。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八大則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康生，黨內有名的情報和肅反專家，與毛澤東的私人關係非比尋常。「大躍進」醞釀期間，主要負責文化教育工作，極力批判「反冒進」，緊跟毛澤東的步伐。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和胡喬木，是黨內地位相當高的兩大「秀才」，其與毛澤東的關係更是任何人無法企及的，雖擔任的職務基本上都是副職，但是其活動的能量卻是巨大的。他們都是八大中央委員，前者是政治局候補委員，後者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他們的編委身份理所當然。

柯慶施、李井泉兩位也都是八大中央委員，前者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後者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兩人在毛澤東醞釀發動「大躍進」運動階段，表現積極，緊跟有功，雙雙在八屆五中全會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又被列入《紅旗》雜誌編委名單，可以說是雙喜臨門。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對柯慶施大加讚揚，特別是他的那篇「乘風破浪」文章。在成都會議上，針對毛澤東的「正確的個人崇拜」論斷，柯就在會議上號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²⁸在八大二次會議上，又與眾不同地作了關於「文化革命」的發言，提出「五年內達到「全民辦大學」以及接近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而李井泉除了積極回應「大躍進」外，其與毛澤東歷史上也素有淵源。李早年參加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曾在毛澤東身邊擔任紅四軍司令部政委辦公室秘書工作並兼管後勤總務，後因「江西羅明路線」問題而遭到「左」傾領導者的壓制和排擠，歷史上屬於「毛派」分子²⁹。

舒同、陶鑄和王任重三位省委書記，以地方負責人的身份成為《紅旗》雜誌編委，可見他們當時的地位也是非同一般，前兩位是八屆中央委員，後一位是八大二次中央候補委員。他們分別為山東、廣東、湖北三省省委第一書記，與毛澤東的關係也是比較親密的。舒同，早年參加紅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下主要負責政治、宣傳工作。毛對舒同一直是非常賞識的，在紅軍時期就因舒同擅長寫作和書法而稱其為「黨內一支筆」、「紅軍書法家」，在其奉命到山東分局傳達延安整風精神之前，親自接見了他並寄予厚望，建國後曾內定他擔任「特殊情況下的台灣省委書記」，因為朝鮮戰爭爆發，攻打台灣計劃擱淺而沒有實現，後打算讓他擔任《人民日報》社長之職，又因當時中央已經任命他擔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而沒有如願³⁰。這次《紅旗》創刊將其列入編委名單，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了卻了毛澤東的一樁心願。

陶鑄在早年革命歷史上與毛沒有任何淵源關係。延安整風時期，同柯慶施一樣，陶鑄也成了「搶救」對象，但他們兩位都受到了毛澤東的保護，有幸得以解脫³¹。建國後，陶鑄受到了毛的重用，經常派他做一些攻堅性的任務，當作「攻堅排」使用。在「大躍進」方面，陶也表現出了對毛的支持，在南寧會議上，陶鑄等人就表示：「趕上柯老，我們要趕。」³²這位黨內少有的敢於放炮、敢於講真話的人也表現出了「順大流」，足見當時黨內風氣不正常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上，陶鑄在發言中，又指出「反冒進」這個方針性錯誤的教訓，就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離開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我們堅決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路線的時候，革命就能取得勝利，反之就一定蒙受損失。」³³他還特別強調要學習毛著，認為「要破除迷信，做到思想解放，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學習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一系列的根本上，捍衛與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說來，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好的教科書」³⁴。陶在讚揚毛澤東方面，可以算得上是柯老第二，真正表現了其要趕柯老的決心。

王任重，也是一位毛非常喜歡和欣賞的地方年輕領導幹部。除了王任重的工作能力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比較有才華之外，還有一個算不上卻又是極其重要的個人因素，那就是眾所周知的毛的游泳愛好，曾有過多次長江之遊，素有「東湖情結」之稱。此外，1958年南寧會議上除了柯慶施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外，王任重也得到了表揚。在王作彙報時，毛澤東就曾指出，「真理在湖北，為甚麼不在別處？他們一年計劃能六年完成，農業能如此，工業為何做不到？問題是過去沒有抓」³⁵。八大二次會議，王任重作了題為《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發言，而就在這次大會上王任重被增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又被毛澤東列入《紅旗》編委名單，成為三個外地編委中最年輕的一位編委，真可謂是年輕有為。

李達，中共早期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建國後，在宣傳和闡釋毛澤東哲學思想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很好地詮釋了毛澤東在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方面的偉大之處，其中尤以《實踐論 解說》和《矛盾論 解說》最為出名。毛澤東多次評價他為「理論界的魯迅」³⁶。這位長期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泰斗級人物、武漢大學校長、中共八大代表，其在當時的理論界、學術界、教育界等領域的威望是很高的，將其列入《紅旗》編委名單，可以說有利於提高《紅旗》的理論威望。周揚，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1937年到延安，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建國後，一直擔任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工作，主要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他是新中國成立後文藝界的實權人物，具體領導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種文藝運動和思想鬥爭，發表了許多重要的文藝講話。自延安之後，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了毛澤東文藝理論的主要闡釋者、宣傳者和代言人。毛澤東將如此一位深諳其文藝思想的文化界領軍人物列入《紅旗》編委名單，也是不難理解的。

如果說以上所涉及的編委都是領導層人物的話，那麼以下的五位編委則主要負責《紅旗》雜誌的具體編輯工作，他們分別是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和范若愚。其中，許立群、胡繩、鄧力群、范若愚四位編委，當時都是八大代表，都長期從事過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

許立群，擔任過《中國青年》雜誌主編，遼吉省委《勝利日報》社社長，新中國成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宣傳處副處長、處長、副部長，兼任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局長。胡繩，擔任過《新華日報》編委，直到抗日戰爭勝利，1955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

任。他長期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和哲學、歷史、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及寫作，在報紙、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其他文章，還發表了一些在哲學和歷史學方面的著作，在當時學術界、文化界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鄧力群，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經濟理論的研究，曾長期擔任劉少奇的秘書工作，「但沒有給秘書名義」³⁷。范若愚，1956年至1959年期間，擔任過周恩來的理論秘書，其間1958年兼任劉少奇的學習秘書。因其對列寧主義較有成就的研究，曾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讚揚，稱其為我國「研究列寧主義問題的專家」³⁸。王力，原名王光賓，早期曾用筆名「王力」，寫了一本描述農村土地問題的小說《晴天》，「各根據地都翻印了這本書，毛主席也看到了」³⁹，得到了毛澤東和康生的賞識。而據王力自稱，他「直接接觸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是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的」⁴⁰，「在一九五七年寫了幾篇重要的文章，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欣賞」，還「參加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那篇文章的整理和發表的工作」，「一九五八年創辦《紅旗》雜誌，毛主席同王稼祥等同志商定要王力參加創辦《紅旗》，作為主管國際問題的編委」⁴¹。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於《紅旗》雜誌第一任編委名單的擬定是經過慎重考慮的。雖然名單確定下來了，但是並沒有被很好地執行下去。據王力回憶，《紅旗》雜誌只開過一次編委會，就是鄧小平主持召開的那一次，以後都沒有召開過。他將過錯歸到了總編陳伯達的身上，他在文中寫道：

編委會就開了這一次會，再沒開第二次會。這一點陳伯達不好，他避開了書記處，他不跟鄧小平打任何交道，忘記了鄧是第一個編委，也不請示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劉少奇，《紅旗》的事情直通主席。陳伯達不通過書記處，不通過政治局，連劉少奇也不報告，只直接向主席報告。這樣，劉少奇就很難插手了。八大一次會議以後，毛澤東強調書記處的作用。劉少奇也強調，要樹立以鄧小平為首的書記處的威信。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工作，有事也是先請示劉少奇，經過劉少奇轉報主席，唯獨陳伯達，甚麼事都直通主席，這個人毛病太大了，誰都不能傷害他，不能干預他。表面上好像很謙虛，實際上不然。他的助手，沒有一個不被他整掉了。⁴²

不知是陳伯達的個人品質的問題，還是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的陳已經參透了最高領袖的意圖，或許是兩者兼而有之吧。

四 結語

總的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熱心地倡議創辦《紅旗》雜誌，積極參與籌備《紅旗》的出版事宜，主要是因為他一方面想借此來為發動「大躍進」運動提供理論思想準備，另一方面又想通過《紅旗》這一宣傳渠道向社會主義陣營乃至全世界宣傳自己的理論，即所謂的「革命輸出」，以達到其「世界革命」理想的實現。

以後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紅旗》創刊後，毛澤東對其還是多加支持和栽培。他不僅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自己非常重要的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還對《紅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論文章嚴格把關，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慮在《紅旗》上發表。而這些經毛澤東批示過的刊登在《紅旗》的文章，都是有其特殊的政治意義的，是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的輿論先導。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時代的《紅旗》雜誌是在毛澤東直接控制之下

的。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到「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從中蘇論戰到「四清」運動，再到文化大革命，《紅旗》可以說是一直在充當著「急先鋒」的角色。它是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的產物，也是毛運用其發動政治運動得心應手的一個輿論工具。

註釋

- 1 姜華宣、張蔚萍、肖甡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32。
- 2 葉永烈：《陳伯達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頁222。
- 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頁165。
- 4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25；《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內部材料）（武漢：武漢群眾組織翻印，1968），頁38。
- 5 參見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27-228；《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39。
- 6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152。
- 7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29-230；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40。
- 8 吳冷西：《憶毛主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62。
- 9 陶魯笏：《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16。
- 10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798。
- 11 葉永烈：《陳伯達傳》，頁222。
- 1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21。
- 13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939。
- 14 毛澤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頁182。
- 15 赫魯曉夫著，趙紹棣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8），頁466-467。
- 16 赫魯曉夫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市政協編譯組譯：《最後的遺言 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頁432。
- 17 吳冷西：《 年論戰 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43。
- 18 吳冷西：《 年論戰》，頁149-150。
- 19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8.1-1958.12）》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98。
- 20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8.1-1958.12）》第七冊，頁97。
- 21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頁1002。
- 22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頁1002。
- 23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頁1003。
- 24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8.1 - 1958.12）》第七冊，頁246。
- 25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958.1 - 1958.12）》第七冊，頁247。

- 26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頁939。
- 27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頁939。
- 28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259。
- 29 段紹鎰： 李井泉三度遭貶 ，《黨史文苑》，2000年第4期，頁22。
- 30 參見舒關關： 父親舒同與毛澤東（上） ，《黨員幹部之友》，2003年第11期，頁54-55。
- 31 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515-516。
- 32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73。
- 33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320。
- 34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321。
- 35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頁73。
- 36 唐春元：《毛澤東與李達：肝膽相照四 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261。
- 37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
- 38 馬原生： 緬懷范若愚同志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學風和品格 ，《理論探索》，1999年第2期，頁5。
- 39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18。
- 40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viii。
- 41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9。
- 42 王力：《王力反思錄 王力遺稿》，頁940。

楊永興 山東日照人，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六 五期 2007年8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六 五期（2007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